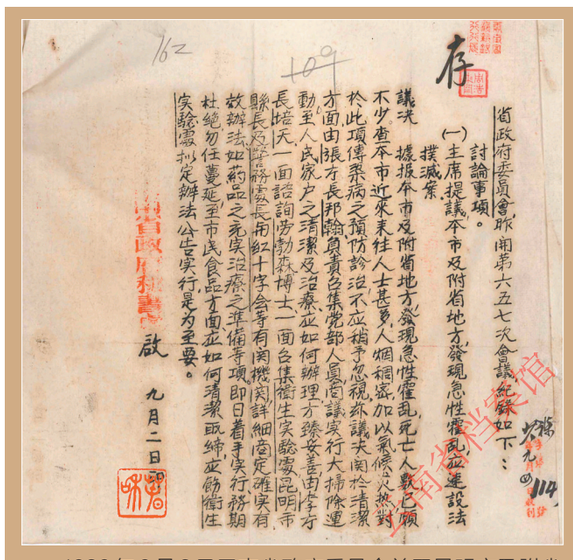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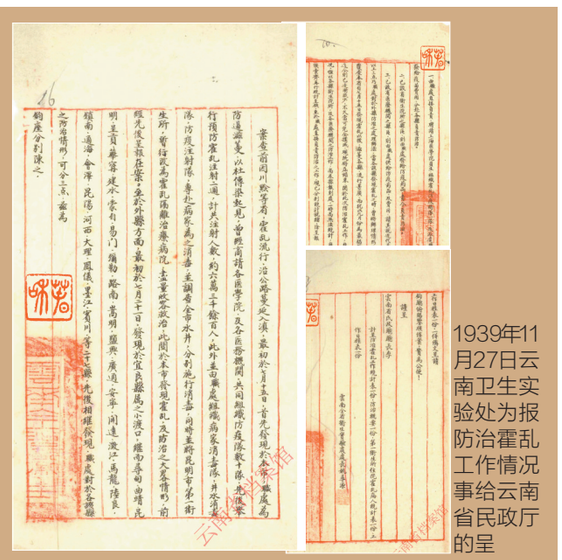
抗战时期云南的霍乱防控（上）

□ 殷俊燕 梁屹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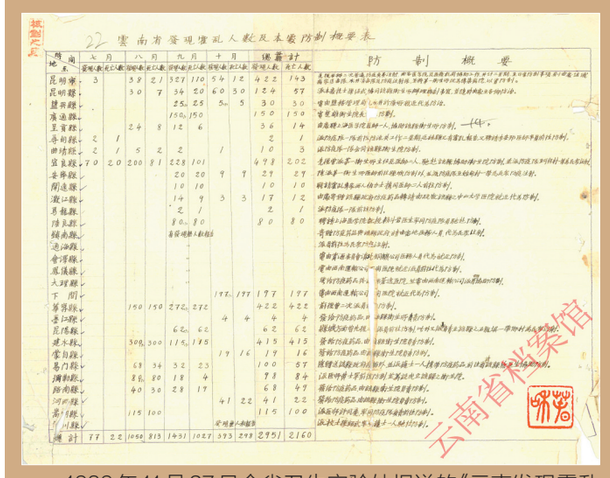
从古至今，人类和瘟疫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人类历史上遭遇了无数的瘟疫，其中有些瘟疫特别严重，甚至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在人类与瘟疫对抗的过程中，科学和医学也在探索中不断进步。近代以来，在人类经历过的瘟疫中，霍乱曾是令人谈虎色变的最可怕瘟疫之一。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患者会因急性腹泻在数小时内腹泻脱水，甚至死亡。霍乱病发高峰期在5月~11月份，可以引起流行、暴发和大流行。据记载，真性霍乱传入中国始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抗日战争时期，云南曾经发生过几次霍乱疫情。在与霍乱的抗争之中，云南近代的公共防疫体系得到逐步建立、完善。



1939年9月2日云南省政府委员会关于昆明市及附省地方发现急性霍乱应速设法扑灭等事议决案



1939年11月27日云南卫生实验处为报防治霍乱工作情况事给云南省民政厅的呈



1939年11月27日全省卫生实验处报送的《云南发现霍乱人数及本处防治概要表》

1941年7月1日 云南省政府为防控霍乱实施防疫注射应行遵守事项事给民政厅的训令

战乱带来的霍乱疫情

近代云南，“僻处边陲”，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由于人员流动不多，真性霍乱尚不多见。1938年后，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日渐发达，人员迁徙数量暴增，军运频繁，霍乱等传染病乘机侵入。

1938年，川、黔等省流行真性霍乱，并沿公路蔓延入滇，其年在昆明市发现两例霍乱病患者，但疫情得到及时控制，没有广泛蔓延。

1939年，霍乱疫情再次在云南大规模暴发。7月15日，在昆明市区发现两例病例，系西南运输处的司机及由贵州来滇的马夫。随后，“昆明市区如高山铺、大观街、云津市场、桃园口、海源寺、阳宗会馆、草纸巷、吹箫巷、普坪村、拓东路、聚奎楼，外及昆明县属之双桥、大鱼镇、船房村、海埂村、张官营、罗占村等处，均有霍乱及类似霍乱疫病发生”，“情形之严重，日甚一日”。至7月21日，又在昆明周边的宜良县大、小渡口发现病例，继而疫病沿交通线迅速蔓延，在寻甸、曲靖、呈贡、华宁、建水、蒙自、易门、弥勒、路南、嵩明、盐兴、广通、安宁、开远、澄江、马龙、陆良、镇南、通海、会泽、昆阳、河西、大理、凤仪、宾川、墨江等26个县大流行。

这次爆发的霍乱疫情持续了近4个月之久。在云南省档案馆保存的一份1939年11月云南全省卫生实验处给云南省民政厅的呈报中记载，“7月15日发生霍乱后，滋蔓各县，流行甚广，而犹以九月份为最猖獗，至十月初始渐衰退，至十一月已逐渐减少。”

这次疫情非常严重，据1940年11月21日全省卫生实验处的一份疫情总结中称，“猖獗程度，为空前所未有”。这次疫情的病亡率非常高，据档案资料中的统计数据显示，从7月15日首次发现病例至11月，全省27个县和昆明市共计发现霍乱感染者3487人，病亡者2515人，病亡率高达74.2%。

经过这次疫情的惨痛教训，云南省政府将霍乱的防治防疫列入每年重要的经常性工作，因此直至1941年，全省无霍乱疫情报告。

1942年，因缅甸战事剧变，大批华侨及撤退军人涌入云南，加之腾冲、龙陵、芒市、畹町等地相继失陷，保山处于混乱之中，致使在境外流行的霍乱又趁机侵入，疫情迅速蔓延至省内58个县，几乎占云南的半数区域。这次霍乱疫情发展之快，流行之广，使已经积累了很多抗疫防疫经验的云南仍然措手不及，防治工作陷于困难。据《续云南通志长篇》记载，当年霍乱感染者达4万余人，尤以滇西的邓川、洱源、鹤庆、剑川4个县疫情最为严重，感染人数达到2万，“其流行惨状，实不堪言述”。

1943年以后，云南省虽然仍有霍乱患者发现，但都没有大范围流行。

应对疫情的最早方案

面对霍乱病毒的肆虐，为减少疫情的不利影响，云南省在政府和民众中普遍展开防控霍乱的行动。在这场由政府主导的防控战疫中，昆明市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云南全省卫生实验处组建于1936年，至1938年夏季云南第一次霍乱疫情在昆明市发现，这个组建不久的部门承担起了全省霍乱疫情的防控工作。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霍乱病毒的特点，在民国档案中记载：“霍乱症系由细菌所传染，属弧菌类传染，媒介由生冷饮食、苍蝇等”，“治疗方法最显效者，系大量生理盐水注射于静脉内，以补充血液和水分”。面对疫情，全省卫生实验处召集各省立医院、昆明市第一卫生所和昆明县卫生防疫所等机构，研究提出了云南最早的应对霍乱方案——《昆明市县区霍乱流行应如何防治案》，这份“防治案”针对霍乱病因、流行特点，提出了预防、治疗的详细措施。其中，关于预防，提出并实施了三项具体方案：

一是实施预防注射。由省立昆华医院第一卫生所护士、助产学校药剂化验班、妇女战地服务团组成6个防疫队，会同昆明市6个区的警察，分往各区，逐户“举行普遍霍乱疫苗注射”。每队设记录1人，专门负责登记被注射人姓名、性别、年龄，注射后发给注射证。昆明县区则由昆明县卫生所在乡村实施逐户预防注射。

二是广泛宣传防疫知识。编印预防霍乱须知，散发给市民，并通过广播广泛宣讲。省会警察局负责发布布告，周知市民接受预防注射，并负责市区环境卫生，取缔不清洁饮水及饮食。

三是以隔离为主的防治方法。“防治案”提出：如霍乱大规模流行，必须收容隔离，由省政府指定能容纳百张以上病床的地点，准备修建临时隔离医院，院址选择市内空闲的学校或者公共处所。对于已经感染霍乱者，注射生理盐水及强心剂。防治费用由省政府设立专门经费，先行拨付给省立昆华医院门诊部及昆明市第一卫生所，用于购买针水、药剂。对于赤贫病人免费施治，对于富人则酌情收费，以补助费用不足。负责实施防治的医疗人员，由省政府各医疗机构医师担任。

这份形成于1938年11月14日的《昆明市县区霍乱流行应如何防治案》，是云南最早的霍乱抗疫防疫文件。通过这份文件可知，此次昆明霍乱疫情，在发现2例后因为应对及时，疫情得到及时控制。这一份文件，也为随后在1939年和1942年爆发的大规模霍乱疫情提供了参考方案。此后数年，云南地方的霍乱疫情防治防疫基本都遵循了这个方案。

霍乱疫情阻击战

1939年6月中旬，云南接到川、黔等邻省发现霍乱的报告，云南全省卫生实验处紧急联系省卫生署曲靖公路卫生站，迅速派人在平彝县（今富源县）入滇路口设立公路防疫站，开始办理入滇人员的检疫及防御注射，并通令各机关严密注意。同时开始向昆明市各医疗机构分发霍乱注射疫苗，为民众免费注射。7月15日，昆明市首次发现第一例霍乱后，感染者被立即送入昆明市第一卫生所进行隔离。8月2日，云南省霍乱防治委员会成立，开始展开一系列防治、防控措施。

云南全省卫生实验处将昆明市第一卫生所暂行改为“霍乱隔离治疗病院”，在昆明市区凡发现霍乱病人，立即收容治疗。昆明县发现病例，由全省卫生实验处派出医师协助县卫生院所收容治疗。昆明以外的其他各县，已设立卫生院所的，由卫生院所负责防治工作；未设立卫生院所的县区，由全省卫生实验处聘请上海医学院医师、护士23人，分为7个医疗队，到疫情县区深入乡村开展防疫和医疗工作。为遏制霍乱滋蔓，又先后组织“病家消毒队”“水井消毒队”和“防疫注射队”，三个队伍同时展开抗疫防治工作。

全省卫生实验处指派专人配合省立护士学校、助产学校的男护士，组织“病家消毒队”，深入到发生霍乱疫病区域和病家（感染者家中）进行消毒，同时劝谕市民凡未注射过霍乱预防针者，迅速到医院注射。省会警察局组织“水井消毒队”，调查全市水井污染情况，分别实施水井消毒和水井防疫改良。全省卫生实验处还组织各医学院及省级医疗机构医务人员270名，组成13个“防疫注射队”，先后分两次到昆明市区及火车站、汽车站进行为期二周的防疫注射。发生霍乱疫情的县，派出专人到省城学习预防注射方法后，回县实施防疫注射。

鉴于霍乱流行，形势紧迫，云南省还邀请医疗专家，组成一支巡回医疗队，办理各县的防治霍乱工作。同时全省卫生实验处沿滇黔公路和滇越铁路调查霍乱疫情，寻找霍乱病菌的源头，最终确定盘龙江水为传染病源头，于是迅速发出布告，禁止饮用盘龙江水，并对水井再次进行消毒。省会警察局还取缔了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饮食和物品。经过云南省政府部门、医疗卫生机构、专家团队和广大民众的艰难抗疫防疫斗争，这场从7月发生的霍乱疫情，当月就得到初步控制，至11月已逐渐减少。

（作者单位：云南省档案馆）

云南口罩运用小史

□ 杨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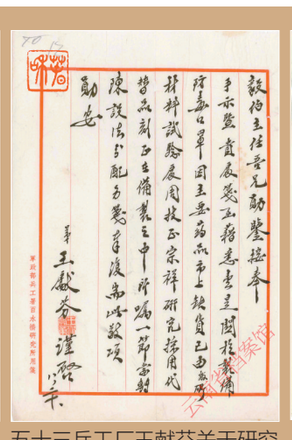
口罩在防治多种流行病或瘟疫中，具有很好的阻止细菌、病毒传播的作用。最近，在全国防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疫斗争中，口罩更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世界上最早使用口罩的国家是中国。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了在中国的见闻，其中有一条这样的记录：“在元朝宫殿里，献食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这样蒙口鼻的绢布，可谓是原始的口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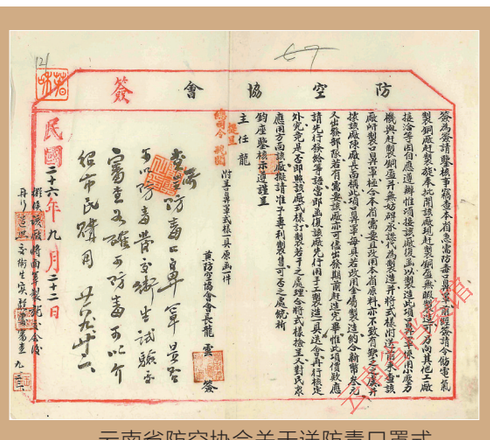
现代意义的口罩始于外科医疗。19世纪，在进行外科手术时，医生口鼻腔中的细菌会传染给患者，从而引起伤口感染。1895年，经德国病理学家莱得奇建议，当时的医生护士在为患者进行手术时，戴上了一种用纱布缝制的掩住口鼻的罩具以防止细菌传播，此举大大降低了患者受感染的几率。从此，各国医生纷纷采纳莱得奇的建议，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口罩开始出现。

我国第一位发明医用简易口罩的是伍连德医生。1910年，哈尔滨爆发鼠疫，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职）的伍连德临危受命，出任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到哈尔滨进行疫情的调查、防治。伍连德通过调查大胆提出，在哈尔滨流行的鼠疫病菌可以通过呼吸之间的飞沫传染，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为了防止鼠疫通过飞沫传播而造成更大的疫灾，伍连德发明了一种纱布口罩。这种口罩制作工序简单，制造原料取材方便，用双层纱布夹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可以有效隔离病菌。这种口罩成本低，当时民众纷纷戴上口罩，感染率大大降低。这也是中国第一个为防止疾病传染而改造发明的医用口罩，被称为“伍式口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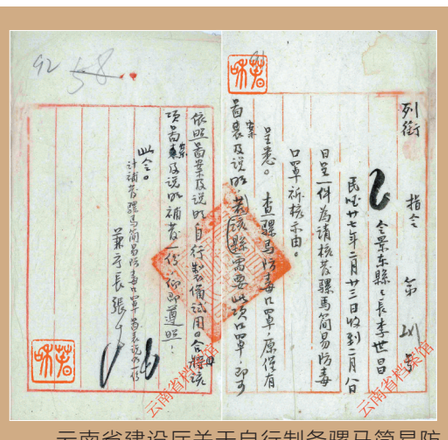
民国档案中的简易纱布防毒口罩制作方法



五十三兵工厂王献芬关于研究制备防毒口罩药品情况的呈



云南省防空协会关于送防毒口罩式样给龙云主任的呈



云南省建设厅关于自行制备骡马简易防毒口罩给景东县政府的指令

1911年4月在奉天（今沈阳）召开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上，这种方便、实用的口罩，受到各国专家的赞扬，据档案记载：“伍连德发明之面具，式样简单，制造费轻，但服之效力，亦颇佳善。”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让中国军民有效防护日军毒气，1937国民政府军工部兵工署编印了一本《简易纱布防毒口罩制法》下发各省，对简易纱布口罩制作作出了具体指导：

“士兵，以作防御毒气之用，此种口罩虽不能防御一切毒气，但有此口罩，决不至为毒气毒死矣。兹述其简易制法及用法如下：

一、纱布。取医用消毒纱布四十层，裁成十二公分见方之小块，以备浸渍药剂之用。另取阔十五公分、长一公尺半之纱布一条，以备缚扎口罩之需。

二、药剂。经试验所得最切实之处方，计有二种：

甲、优洛托品、碳酸钠（粉状）、硫代酸钠、水、酒精。配成溶液。

乙、优洛托品、碳酸钠、水。配成溶液。

三、浸渍。以十二公分见方之纱布四十层，浸入上述药剂甲或乙，任取一种。待完全湿透后取出，挤至半干（按上述药方所开之分量，适足配制一个口罩之需，故不应有多量之药液挤出，如欲多制口罩，则所配之药量，依上述处方昭照加）。

四、缚扎。以浸渍药剂之纱布，覆罩口鼻部分，外以纱布围绕缚扎，松紧适度，要能完全缜密，使吸入空气，必须经过口罩透入。

五、效力。如浸甲种药剂之口罩，其抗毒时间（以光气浓度千分之一计算）为十五分钟，战地之毒气浓度较淡，约可支持一小时以上。如浸乙种药剂，则口罩之抗毒时间为二十分钟，战地浓度较淡，约可支持二小时以上。

六、卸除。口罩用久后，如察觉有毒气侵入，必须更换，如已无毒气存在，则应取下，以清水洗涤，再浸药剂，仍能复用。”

据档案记载，当时云南省政府共收到250册《简易纱布防毒口罩制法》小册子，省政府主席龙云立即下令分发各地、各局遵照执行。当时的五十三兵工厂开始制备这款口罩，挽救了许多抗日将士的生命。

当时，云南电气制铜厂还结合云南本地情况，制作了一款较高端的防毒口罩，“使用薄铜片压成鼻型，着肉部分用本省熟皮紧镶鼻型之上，即与橡皮制者无异。至出货数目若不赶工，每日可交一千套之谱，倘需要紧迫，尚可多出。”这样的面罩制作成本高，需“新币三元”，不是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能消费得起。

当时，骡马是云南运输抗战物资的主力，为防止骡马感染疫病，云南省建设厅还为骡马设计了简易口罩。据档案记载，1938年2月，景东县长呈请省建设厅，要求核发骡马简易口罩及使用说明，但建设厅仅向该县下发骡马口罩简易图案及说明，让其自行制备。

（作者单位：云南省档案馆）

文史资料

改土归流与六大茶山

——普洱茶的十五个重要历史发展节点（三）

□ 蒋文中

西双版纳易武茶马古道遗迹 张彤 摄

第十个节点：滇南改土归流和对普洱府地区的开发

清雍正年间，滇南改土归流和对普洱府地区的开发，是普洱茶发展的第十个重要历史节点。

雍正四年（1726年）、五年（1727年），澜沧江以东的景东、景谷很快完成了改土归流后，清廷将普洱地区划归元江府，改为流官制。雍正七年（1729年）七月，云贵总督鄂尔泰宣布成立普洱府，强化对滇南边陲地方之控制，以宁洱为府治，置通判分驻思茅。同年，清廷在景洪攸乐山增设“攸乐同知”，驻右营，统兵五百，负责征收茶税等事务。另在勐海、勐遮、易武等地设立“钱粮茶务军功司”，专门负责管理当地赋税和茶政方面的事务。至雍正八年（1730年）又在思茅设总茶店，负责管理六大茶山茶叶贸易及相关贡茶事宜。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实现了对滇南普洱府地区的开发，极大地促进了云南茶业的发展。

清代对滇南普洱府地区的改土归流，从封建王朝的主观意图来说，当然是为了加强统治，但在客观方面，由于打破了各个土司领地的疆界隔断，使各族人民之间的往来增多，民族隔阂相对减弱，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也有利于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这一举措不仅促进了云南茶叶主产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特别是与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交流，使普洱茶成了云南西部、南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助推器。

第十一个节点：清代六大茶山的兴起

清代六大茶山的兴起及其成为普洱茶生产重地，是普洱茶历史发展的第十一个重要节点。

清代普洱茶的主产地是以西双版纳古六大茶山为中心，覆盖面波及云南省澜沧江中下游一带地区。从明代直至民国，因茶叶贸易的推动，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六大茶山作为云南茶马古道的源头，也因其在普洱茶生产中的地位而成为澜沧江中下游的一个经济中心，即贸易集散地，并对云南的政治、经济、生产、消费、交通、运输形成了较大辐射和影响。

清代，由于六大茶山是茶叶经济和贡茶核心区域，在清廷高度重视经营下，普洱茶品牌由此兴起并成为普洱茶生产重地。作为普洱茶最主要的核心产茶区，六大茶山发展进一步走向鼎盛。

关于六大茶山，写得较早且较详细的是清嘉庆四年（1799年）檀萃的《滇海虞衡志·卷之十一·志草木》：“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慢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及光绪《普洱府志·卷之十九·食货志六·物产》：“思茅厅采访：茶有六山，倚邦、架布、熞峧、蛮砖、革登、易武”。上述两条史料，地名有些出入，对此，1957年11月至12月，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政府组织专业茶叶普查工作队实地普查确定为：盛产普洱茶的六大古茶山位于云南西双版纳，今六大茶山是易武、倚邦、攸乐（基诺）、慢撒、蛮砖和革登，这与历史上所称六大茶山攸乐、革登、倚帮、莽枝、蛮砖、慢撒，略有出入，这是因为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随莽枝、架布、熞空茶山的逐渐衰退，易武茶山取而代之。古六大茶山除攸乐属于今天的景洪市，其余五大茶山均在今勐腊县境内。

清朝对滇南普洱府地区完成改土归流后，为巩固加强对六大茶山的控制，除在六大茶山之首攸乐山设同知驻军外，还扶持忠于朝廷的土千总曹当斋为六大茶山总管，将六大茶山定为贡茶和官茶采办地，并制定了严格的管理条令。在清廷的直接掌控下，六大茶山的茶业经济发展迅速，成为普洱茶的主产区。

清乾隆至咸丰年间是六大茶山最为鼎盛的时期，茶园超过10万亩，出现过十多万人入山作茶的繁盛景象，其兴旺、繁盛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初，因帝国主义入侵和战争动乱走向衰落。可以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整整一个朝代对一个位于边疆产茶区的重视莫过于云南的六大茶山时代了。普洱茶从藏在边地人未识到名重天下、誉满四海这段崛起的历程和茶马古道的源头这段厚重的历史，就刻写在六大茶山。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科院）